



简论西夏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发布日期：2007-12-13 8:44:03 作者：陆宁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宣传部,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唐末以来，在诸多政治和军事集团的并立与混战中，党项及其政权之所以异军突起，倚靠的不仅是统治集团日益增强的军政实力，更重要的是其控制区域内持续发展的多种类型的经济，这包括兴灵地区的平原农业、银夏地区的山地农牧业、河西走廊地区的绿洲农牧业。发达的交通和贸易正是不同经济区域得以沟通乃至形成对周边地区民族经济辐射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党项；西夏；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7)06-0025-04

关于西夏经济与地理关系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所见论著主要有王天顺的《西夏地理研究》、杜建录的《西夏经济史》、宋乃平的《西夏的地理环境及农牧业生产》，这些研究对西夏经济和西夏地理做了详细的研究。与上述研究略有所区别，本文主要探讨西夏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类型的关系问题。

一、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

在10世纪初叶，西夏地理环境可以大致区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以平原为主的兴灵地区，二是以山地为主的银夏地区，三是以绿洲为主的河西走廊地区。根据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特点，西夏因地制宜发展了农业、牧业和半农半牧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经济类型是毫无关联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农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叉和转换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西夏地理环境和农业之间的关系。7世纪中叶，党项内迁以前，其社会生产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地处山谷间”和气候上的“多风寒”而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其生活则是“牧养犛牛、羊、猪以供其食”；内迁后，在先进的汉族农业文明影响下，党项羌逐渐学会了农业耕作，但由于活动范围长期宥于干旱山区与沙漠草原地带，“树艺殊少”^[1]（9426）。直至10世纪早期，党项势力进一步深入到灵州以西和河西走廊一带，其总体自然条件比以前相对丰富和有利，这时农业才逐渐成为西夏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尽管他们所迁居的地区，冬天是西北干寒季风冲击的方向，夏天是东南温湿季风的末梢地区，但这一地区的河水资源却相当丰富，黄河自西南而东北流过，祁连山积雪融水，汇聚成石羊河、疏勒河、黑河三大内陆水系，使党项发展不以旱涝为虞的灌溉农业成为可能。同时，党项内迁后所占据的黄河以南灵州一带的大片土地、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地区都是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

从自然条件看，兴灵地区是夹在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一块冲击平原，处在黄河转折的地区且东、西、北三面环河。秦汉王朝曾在这里大规模屯田实边。西汉继续秦的政策，不仅建置郡县，还迁徙了关东无地农民进行开发，因此中原地区的耕作技术很早就传到了这里。特别是由于三面靠河，历代朝廷戍守此地，总以修渠灌溉为主，如相传修建于秦代的秦渠，“自黄河开闸口七十五里，溉田九百余顷”^[2]（卷3）。由于长期灌溉，使地面沉积了深厚的淤灌层，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灌溉系统，对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屹立于平原西、北两侧的贺兰山与阴山山脉，大大削弱了冬季寒流的侵袭，同时也阻挡住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特别是兴灵平原，气候温润，适宜于稻麦生产，是西夏最重要的产粮区和最富庶的区域。

从兴灵越过毛乌素沙漠，即到了西夏南部边陲东起横山西至天都山的蕃汉杂居地带。区内既有发源于横山的无定河，浸润着两岸沃土；也有位于今宁夏海原县境内山间泉水灌溉、植被繁盛的天都山，其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得这里的经济形式以农业生产为主。史载“葭芦、米脂二城，里外良田不下一、二万顷，国人谓之歌头仓，又名真珠山、七宝山，言其禾粟多也”^[3]（300）。盛唐在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河曲之地设立六胡州，大批突厥人被“列为编氓”后，“安其耕凿，积年有序”。开元九年（721）唐朝镇压了当地突厥

康待宾的起义之后，将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迁出，党项羌随之迁入本区，继承了突厥人留下的农田渠道。进入宋代，党项从事农业生产的现象比较普遍。先进的内地农业文明特别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对党项在新环境中进行生产劳动、学习耕作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基础。唐代王方翼任夏州都督，由于牛疫，“无以营农”，创造了“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4]（4803），这说明兴灵一带同内地在农业生产方面早已息息相关。

其次，我们来看地理环境和畜牧业的关系。畜牧业成为西夏地域极为重要的经济类型，与她拥有优良的牧场和畜牧条件有直接关系。早在公元6世纪后期，党项人居住在今甘青川三省毗连的山地草原，草甸型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党项羌单纯的“不知稼穡”的游牧生活方式。唐贞观以后，迫于吐蕃奴隶主政权的逼迫，党项及其他诸部内迁至秦陇交界的庆州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银、夏、绥、宥等州，他们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牧场辽阔、水草丰美的优越地理环境，积极发展传统的畜牧业。唐代文献《文苑英华》卷370沈亚之《夏平》记载了他们的游牧生活：“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到宋初，西夏畜牧业流行的地区和畜牧生产方式已经大大扩展。贺兰山又名阿拉善山，史载此山“冬夏降雪，有种种丛林、树、果、芫蕘及药草，藏有虎、豹、鹿、獐，挡风避众”^[5]，这里生态环境相当好，是良好的天然牧场。银夏之北的鄂尔多斯地区，雨量稀少，除茫茫沙海外，地面多生牧草。早在春秋战国至汉代末年，就曾是匈奴发展畜牧业、借以生存的重要基地。北魏政权兴起后，大量的敕勒牧民也在这里从事游牧业，高峰时期，养马200余万匹，骆驼百万头，牛羊无数。到了党项控制这一地域的时候，这里仍然维持了较为发达的畜牧生产。

最后，我们来看地理环境和半农半牧类型经济的关系。半农半牧地区的经济在西夏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横山地区和河西地区是西夏两块典型的半农半牧区域。

横山地区，“南连耀州，北抵盐州，东接延州，绵亘八百余里”^[6]（卷52），大体包括在银、夏、绥、宥诸州内，是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连结处。宋初，尽管夏州城已“深在沙漠”之中^[7]（777），但大多数地方的植被还相当完好，水草丰茂，多马宜稼。活动在这里的蕃部族帐既从事畜牧业生产，又进行农作物的耕种，过着定居与半定居的农耕与放牧生活。《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帐族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7]（1107）其中“刍粮八万”、“牛羊、器甲二万”基本反映了沿边部族兼营农业和畜牧业的状态。从地理位置看，横山山界半农半牧区与北宋王朝相毗邻，同牧业区相比，它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更为密切。北宋西北地区的耕畜，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民间和市的方式，从党项控制的山界地区得到补充的。显然，半农半牧区的畜牧业，不完全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其产品的商品比重较高。

河西地区，处在丝绸之路的西段，东起乌鞘岭，西抵玉门关，东西长达1300公里。南面有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山脊一般海拔在4000米以上。北面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环绕，统称为“北山”，山势比较低矮，一般在2000米以下。海拔4000米以上的祁连山终年积雪，形成1400平方公里的冰川，每年春夏之际，这些冰川大量融化，汇聚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年径流量65亿立方米^[8]。祁连雪水一方面浸灌着走廊的万顷良田，形成一片片沙漠绿洲，另一方面也滋养着丰美的牧场。《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9]（2908）焉支山，又名删丹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10]（1072）。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也载：“积雪大山（即祁连山），山高，冬夏降雪，雪体不融。南麓化，河水势涨，夏国灌木宜农也。”“焉支土山，冬夏降雪，炎夏不化。民庶灌耕，地冻，大麦、燕麦九月熟，利养羊马，饮马奶酒也。”^[5]从自然条件看，这里大片的草原草山，未开发的荒地极多，这对发展畜牧业非常有利。同时水利资源比较丰富，不仅解决了牲畜饮水问题，而且有利于小流域灌溉农业的发展，农牧业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二、商路与贸易

西夏各个地域的地理位置都比较优越，交通道路都比较发达，贸易历史也比较久远，这保证了西夏各个经济类型区之间得以沟通，并且最终形成对周边地区民族经济的辐射。

西夏的交通路线形成了三个中心：一是灵州。从南北朝以来，一直是河套地区的中心。从灵州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北至顺州路；东至盐州路；南至环州路，从环州再南，则经庆州、邠州、咸阳至长安，这条路直到北宋初年仍十分重要，既是中西使臣、商旅的必由之路，又是朔方军镇与关中联系的纽带；西至凉州路，由灵州西渡黄河，折向西南经雄州至凉州，其走向在《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所录《高居诲使于阗记》有详载：“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岩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11]（917）二是夏州。在唐代已是由关中东到漠北的门户，向南经延安可到关中取农耕之丰饶，向西北可到大漠、草原取畜牧之富有，向西则至盐州、甘、凉取矿产、贸易之便利。盐州盛产青白盐，西夏通过夏州—盐州这样一种纵深的战略发展获得了大宗的对外交易产品，尤其是党项立国后，这一地区成为其重要的外贸基地。三是凉州。《新五代史》称“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11]（913），是中原战马的供应地。同时凉州地区地势土质尚好，有祁连山融冰化雪之水，宜农宜牧，是古代西北重要的经济区，汉唐丝绸之路的最佳途径，更是耕战皆佳的重要地区。西夏利用这些地区发达的商路，东可通中原，北可通契丹，西可通回鹘、吐蕃，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为主的贸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转角色。

早在唐朝，党项羌人就与中原开始了频繁的贸易活动。唐朝政府规定除了盔甲器械等不得售与党项外，其余的都可以交换、贸易。中唐后则一直保持着与中原王朝密切的贸易联系，无论民间互市还是官方榷场，马、牛、羊、驼都是大宗输出的物品，特别是党项马最受中原欢迎，有元稹“求珠驾沧海，採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的诗歌为证。贞元三年（787），唐朝“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4]（5293），从这条禁令看，在中唐或更早，党项羌对外贸易业已发生，及至唐末五代，这种贸易日益显示出繁荣的趋势。西夏对外贸易有以下三种：

首先，与中原王朝交易青白盐。西夏控有的地区粮食产量不足，但盛产价廉物美的食盐，尤其是青白盐，因此食盐就成为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物品和重要财源。《新唐书·食货志》说：“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这里是青白盐的主要产区。池内的盐水，经日晒成盐，青盐品质纯净，以稍带青绿色得名，更比白盐为优，此外还有碱隈川周围约十里所产红盐。党项人从干涸的碱水池里取得大量盐粒，运往关中，供应内地人民的需要，然后从关中购回自己所需要的粮食。这种贸易对双方人民来说，以无易有，互相补充，都是有利的。但宋太宗为制服李继迁，于淳化四年（993）采纳郑文宝的建议，“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7]（894）。盐禁的结果，使外则“戎人乏食，相率寇边”，内则“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1]（9426）。在内乱外扰的困境下，太宗只好遣钱若水驰禁，开通关市。西夏建立以后，与宋朝关系长期敌对，因此食盐的出口受到宋朝的公开抵制。这样，西夏方面就采取各种走私的方式大量输出青盐，而实际贸易数额是相当巨大的^[12]。

其次，控扼中继交易。西夏控扼了丝绸之路上居间各国的商旅，并从中牟取利益。党项所居之地是当时南北东西交通枢纽，这使党项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主动权。西夏从宋朝购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西北其他少数民族，“惟茶最为所欲之物”。最后，直接掠夺财富。党项人利用地理的优势，对过往商人运用经济的、武力的手段进行财富掠夺。《旧五代史·党项传》载：“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以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13]（1844）《宋史·回鹘传》则记曰：“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1]（14116）这种劫掠，有时连中原王朝的官商也不放过。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二年，“灵州、通远军诸蕃族剽略官纲，诏知灵州安守忠、通远军使董遵诲讨之。遵诲部分将出，诸蕃族大惧，尽归所剽略，肉袒请罪，遵诲即慰抚之”^[7]（417）。

参考文献：

- [1] 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2] 嘉靖宁夏新志 [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 [3] 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 [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4] 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苏]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 [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 [6]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8] 汤奇成，程天文.河西走廊的河川径流 [A].中国干旱地区自然地理 [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 [9] 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 新五代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12] 陈旭.宋夏之间的走私贸易 [J].中国史研究.2005（3）.
- [13] 旧五代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76.

【责任编辑 谢海涛】